

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 在中国革命中的胜利发展*

——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

凯 文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一个基本特点。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条件与历史条件,不同的主要打击对象和各种同盟者的不同政治态度以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确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的理论概括,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宝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原则的创造性发展。

一、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

近代中国曾经是处在各个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极端动荡的半殖民地地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所以在许多场合各帝国主义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又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各有攫取最大利益的垄断野心,他们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而使得他们的阵线常常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影响到他们所支持的军阀——封建买办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使得作为当时中国统治营垒的军阀内部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的;第三,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压迫,中国人民逐渐在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联合力量,而这个联合力量又是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尖锐对立着的。这样,近代中国就成为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成为各帝国主义相互间激烈争夺的焦点,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斗争的焦点;因而也就使得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可能充分利用各种矛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结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

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是一回事,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实现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是经历了艰难困苦、曲折的历史过程的。

早在1917年7月,毛泽东同志就论述了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当1922—1923年的工人运动的高潮遭到了全副武装的反动统

* 本文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而撰写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第五篇。

治的镇压，革命不得不暂时转入低潮时，党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①在1923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便开展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决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当时党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国民党是官僚的政党，加入国民党会使共产党腐化，因而反对加入国民党；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认为共产党不应有任何独立工作。党的三大批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终于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帮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且改造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胜利地开始了北伐战争。

这时，革命统一战线虽然建立起来了，但由于国内的反动势力十分强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的反共力量形成，并且掌握了武装，帝国主义列强眼看北伐战争的胜利直接威胁他们在华的根本利益，便支持反革命封建势力并极力收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革命，再加上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而当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一旦叛变革命，就束手无策。在这革命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当时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地提出了谁是革命的真正的朋友，谁是革命的真正的敌人的问题，要求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本质特征。他要求党充分地估计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坚决地领导农民斗争，武装农民，在乡村建立革命政权，以壮大和巩固革命的基础。然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了当时坚持投降主义错误的陈独秀的拒绝，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遭到严重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了。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从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党认识到了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对建立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特别是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乃至以后的几次中央会议都不能正确地估量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过于忽视敌人的强大，并且否认当时“中间营垒”的实际存在，以致使中国共产党内先后出现三次“左”倾盲动主义。那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同志错误地认为中国当时只有“两个势力的对立”，认为中间派别都一样是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并且空喊：“在中国民众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民众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由于执行这种“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党陷于极端孤立。在这个时期内，毛泽东同志坚持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在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坚持了正确的路线，强调党应注重中间阶级问题。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指出：“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②“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③但是毛泽东同志这些正确主张，都没有得到当时中

央领导机关的重视，一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可能开始得到贯彻执行。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向中国进攻，中日两个民族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英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以及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下降，这时，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更为积极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阶级中(除一部分主张亲日的投降派外)的英美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抗日，形势对重建统一战线极为有利。这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迅速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④为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停止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终于形成了。当然，这以后还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同志都作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使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充实和完善，使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二、对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总结，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奠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重新走向新的高潮。这时，由于长征的胜利，中央有条件来解决遵义会议来不及解决的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政治策略诸问题；同时，自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于是1935年12月中旬到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议。瓦窑堡会议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对党的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进一步分析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中间势力的特点，说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基本政治态度具有两面性，既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又有很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然而我们党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认清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这个特点，因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犯了“左”倾错误。在1927年5月党的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认为“四·一二”“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大资产阶级了。党的“六大”的决议又指出：中国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这样，就把民族资产阶级完全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孤立了自己。这两次大的错误，结果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毛泽东同志早就对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中，就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初步分析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随后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又指出：“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⑤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中央领导时，毛泽东同志坚持认为在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在农村富农与地主也有不同，我们必须正确地 and 尽可能地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不同的中产阶级。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根据地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否认一切“中间营垒”存在的主张相反，规定并执行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的政策，因而不断地壮大了自己。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深刻的科学的论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⑥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因此，他们“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⑦毛泽东同志还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大量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那种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提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从理论上和策略上为解决统一战线这一复杂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进一步分析了买办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反动营垒内部矛盾也应利用的策略。

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争夺的半殖民地，因而形成了依附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的地主买办集团；又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所引起的矛盾，地主买办集团之间也不断发生冲突，所以“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⑧毛泽东同志强调说，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每一缝隙，必须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⑨

第三，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强调了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小小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当然，一方面由于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一定要比过去快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革命力量的发展又不平衡。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因而中国的革命的斗争是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这种形势就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⑩

第四、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在反对当时主要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时，又要防止另一种右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告诫全党在主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必须记取陈独秀放弃

无产阶级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说，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而我们又缺乏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一招降，先是蒋介石叛变，后是汪精卫叛变，革命失败了。今天，情况虽然不同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有了，但是，“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面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⑩

第五，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适当调整党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⑪现在，既然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其走狗的人们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联合战线，那么，我们就应当据此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共和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我们就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什么要这样改变呢？毛泽东同志说的十分清楚：“这是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⑫当然，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仍然以工农为主体，只不过可以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再如在联合蒋介石抗日的问题上，我们党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的。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鉴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党中央的口号是“反蒋抗日”。到1936年7月，形势进一步发展，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使得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表示不能签定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形势的发展证明，吸收蒋介石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于是在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明，放弃“反蒋抗日”方针后，中央实行的是“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蒋抗日”的方针虽然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但“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而且强调“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行这一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和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达成联合抗日的协定，并在国统区深入开展青年工作，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到三个月，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为了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发出通电，提出“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终于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迫使蒋介石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这就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前提，从此，中共中央适时地将“逼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联蒋抗日”的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革命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进一步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了。

三、对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杰出贡献

统一战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过：“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

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⑭1883年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阐述了贯彻《共产党宣言》的始终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他说，阶级斗争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⑮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的基本思想十分明确，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问题，正是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根据。

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比艰巨的革命事业，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无产阶级必须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明确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并且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⑯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取广大的同盟者，而且指出工人阶级内部也有统一战线。《共产党宣言》中就讲了“共产党人对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态度”，列宁在《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也指出：“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那些由无产者到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由半无产者到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由小农到中农等许多形形色色的中间阶层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没有分成比较开展和比较不开展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末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⑰1922年，列宁更明确地指出在工人中发展统一战线。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战线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而不断丰富充实起来。

在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杂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使统一战线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和多方面的展开，从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⑱到1940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把这条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来：“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面，看不见他们的反动性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

讲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看见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一面，看不见他们积极性的一面，对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这两次机会主义路线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就是同这两种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产物。

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其目的在于对他们的革命性一面尽可能加以团结，而对其动摇性的一面，则适当地实行批评和必要的斗争，以便不断坚定其革命性，克服其动摇性，使他们和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联盟，或者至少保持中立，这样就便于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不同，团结和斗争的具体方法也就不同，有各种不同的联合，也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和斗争。总之，又联合又斗争，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团结中有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团结起来，对付我们的主要敌人。

第二，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统一战线甚至包括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即同我们党进行过十年内战的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同志对这种情况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这种统一战线内实际存在左、中、右三个不同的集团。于是相应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所谓进步势力，在当时就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谓中间势力，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仕绅和地方实力派。至于顽固势力则是指国民党蒋介石当权派一些人。毛泽东同志认为发展进步势力是重要的一环，“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②争取中间势力也是很重要的。中间势力的特点是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他们能否为我们所争取，往往成为我们同顽固派作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要达到争取他们的目的，则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③孤立顽固势力也十分重要。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不可缺少的手段。对顽固派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这样的斗争的原则，当然首先是为了自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但是，这种斗争也不可无休止，要有一定的节制。只有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争取时局走向好转。

第三，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保持自己取得的阵地的前提下，不断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在军事上主张“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是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任凭蒋介石去吞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1）统一战线中的互助互让是必要的，但应当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2）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的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④（3）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的口号是错误的，其实质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屈膝投降。所以，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明确作出结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按照这个方针就可以使抗日战争的结局，成为人民的胜利。

第四、关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在同顽固派作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三个敌人是都要打倒的，不能只打倒一个，不打倒另一个。但是面临三个强大的敌人，不可能一次都打倒，只能各个击破，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各派帝国主义利害不一致，他们所扶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互之间往往利害也不一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缺口和裂缝，这样就给我们党提出了要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的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这个斗争策略原则。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以后一段时期内，在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中区别掌握中央政权的当权派和地方实力派；在地方实力派中区别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在政治上又区别反共派和反蒋派；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又区分出嗜打内战的死硬派和比较开明的主和派，等等。这样，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那怕是一定时期或一定问题上的暂时同盟者，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减少革命的阻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正确总结了 this 经验，明确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③

四、统一战线理论的继续丰富和发展

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斗争实践，对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首先，是关于建立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农民和工人阶级一样受着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迫切要求土地与自由，因此，在这一革命阶段内，要正确解决农民问题就必须充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民主要求，建立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日本投降后，农民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作出决定，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和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1931年至1943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④为了胜利地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同志指出还必须注意两条基

本政策：一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一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又详细讨论了土地改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后，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明确规定：“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②⑥}当然，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但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也是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因为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才不会使自己陷于孤立而使土地改革失败。

为了团结好中农，结成巩固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还就如何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真正实行党的领导权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②⑦}

第二，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②⑧}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在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同盟的同时，又同他们建立了经济联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的政策，经过反复地教育和协商，成功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办法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胜利。但是一直没有条件实现。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也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列宁还曾建议资本家“服从国家的调节吧，服从国家的政权吧，这样，就可以不必完全废除适合于人民的旧利益、习惯与观点的那种条件，而可以得到国家调节的办法来逐渐的改变这一切。”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不愿意服从国家的监督，还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用战争的办法推翻苏维埃政权，这样，才对资产阶级采取剥夺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的政策，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过程中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并使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毛泽东同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的伟大胜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作出的新的光辉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②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更加广泛了，它已经发展成为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下转第44页）

历史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这是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依据这条原则研究历史，就会在科学认识论的指引下，在历史研究中作出贡献。反之，必然在浩瀚的资料海洋里无所建树甚至给后人布下新的迷网。坚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结合，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就会给革命造成危害。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归根到底要受到一般规律的制约，同时每个国家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千差万别又使它的革命道路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各国革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 ③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 ⑤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5页。
-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6页。
-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页。
- ⑧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上接第9页）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我们并不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热爱祖国，赞成祖国统一，不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就应当团结他们，和他们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是党中央关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并把它们同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特点结合起来，和党中央的政策结合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灵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将会更加大放光芒。

注释：

- | | |
|--|--|
| ①⑧⑨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571、134、597页。 | 285、283页。 |
|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4—75页。 | ⑩⑪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226、229页。 |
| ④⑥⑦⑧⑨⑩⑪⑬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7、143、131、134、141页。 | ⑩⑪⑫⑬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21、740—745，525—526、528页。 |
|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页。 | ⑭⑮⑯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0、1153、1163页。 |
| ⑫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页。 | ⑰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
| ⑭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4、 | ⑱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